

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研究

肖 威

摘要：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在转型国家背景下，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省际宏观经济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倒U型，即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最初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劳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阻碍经济增长；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现象同时存在的理解。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为同时实现稳增长和社会公正的目标，本文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对资本性收入进行税制改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劳动收入差距；资本收入差距；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0) 08-0067-15

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不断的转型过程中，实现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与之相伴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不平衡发展集中体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上。如图1所示，基尼系数高位运行十多年，同时经济增长率与基尼系数的走势也基本保持一致。这引来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还能持续保持较快的发展？为什么近年来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有所缩小的背景下，经济增速却持续下行？这是否意味着，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容忍甚至扩大当前已经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

在理论上解释清楚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当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既保持平稳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又能缩小

[收稿日期] 2019-09-02

[基金项目] 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研究”(20SKGC-QG09)。

[作者信息] 肖威：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讲师 362021 电子信箱 xiaoweix@hqu.edu.cn。

收入分配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都有赖于对该问题的深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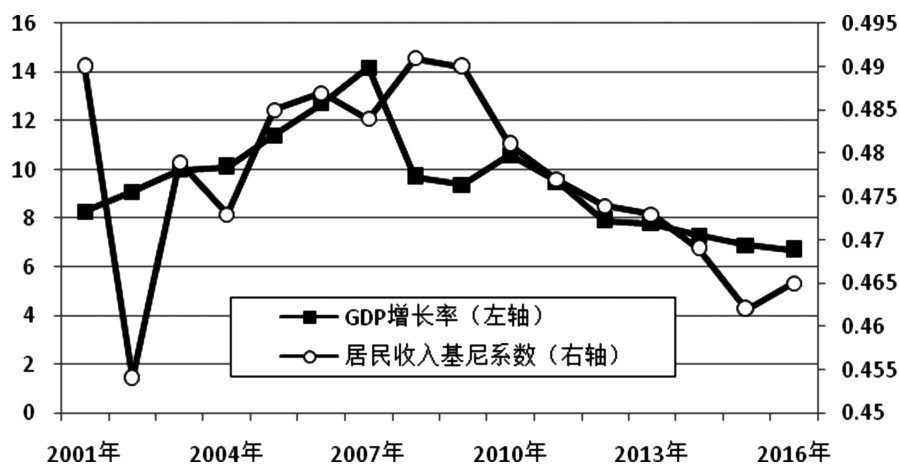


图1 GDP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走势

一、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 从观点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 Lewis (1954)^[1]、Pasinetti (1962)^[2]强调富人的边际储蓄率高于穷人, 因此收入不平等会提升整体储蓄率和投资率,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Chiu (1998)^[3]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Li 和 Zou (1995)^[4]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模型, 设定政府的服务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消费性的, 结论显示收入不平等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有更多的论文强调收入不平等对于要素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 因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Bénabou, 1996^[5]; Galor and Tsiddon, 1996^[6]; Saint and Verdier, 1993^[7])。第二类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包括政治经济模型 (Alesina and Rodrik, 1994)^[8]、信贷约束—投资机制 (Galor and Zeria, 1993)^[9]、收入分配的 Big Push 理论 (Murphy et al., 1989)^[10]等。第三类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复杂的、依条件而不同的, 如 Galor (2000)^[11]、尹恒等 (2005)^[12]、靳涛和邵红伟 (2016)^[13]。

从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角度来看, 可以把现有文献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机制强调收入分配差距对投入要素的刺激作用, 可以称之为刺激机制。研究者一般认为收入差距是能够刺激要素投入的, 因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类机制强调收入分配差距作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会影响经济增长, 如消费机制、储蓄—投资机制、Big Push 理论、政治—经济模型、人力资本机制等。研究者大多认为收入差距引致经济环境变差, 因而阻碍了经济增长。事实上, 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本身都是经济运行的复杂结果, 只关注于某一种机制的研究往往无法

得到统一的看法。对此, Ferreira 和 Gignoux (2011)^[14]指出, 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跨国实证研究尚无定论, 原因可能在于把多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混在一起了。因此有必要分别讨论不同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也就是用结构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在收入不平等的结构化研究方面, Roemer (1998)^[15]的研究影响深远, 他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两部分: 努力程度不平等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和环境因素引致机会不平等带来的收入不平等。之后的学者沿着这一思路, 在分解方法的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 (Ferreira and Gignoux, 2011; 江求川等, 2014^[16]; 龚锋等, 2017^[17])。收入差距的结构化研究, 也推动了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化研究。Bourguignon 等 (2007)^[18]认为, 努力不平等引致的回报不相等,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邵红伟和靳涛 (2016)^[19]把收入差距分解为自然性收入差距、制度性收入差距和结构性收入差距, 其中也暗含了它们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的思想。Marrero 和 Rodríguez (2013)^[20]经过实证研究, 发现了努力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努力不平等的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 而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差距阻碍了经济增长。雷欣等 (2017)^[21]借鉴他们的研究, 对中国的收入不平等进行了机会和努力两方面的分解, 并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了与之一致的研究结论。

既有文献从多个层面、多种渠道研究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大大地丰富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收入差距结构化思想, 对于深入研究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但是, 西方学者在讨论机会不平等时, 所关注的大多是种族、地区和父母受教育程度 (Marrero and Rodríguez, 2013; Ferreira and Gignoux, 2011); 他们往往回避一个极为重要的机会不平等, 即资本占有上的不平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 本文将着重把收入差距分解成两个方面, 即劳动投入不相同引致的收入差距和资本占有不平等引致的收入差距, 并研究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另外, 现有研究都是将不同来源的收入降维成总收入, 再进行不平等分解。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损失了大量关于收入的信息, 需要得到进一步改进。本文从收入来源的角度分析不同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能够有效地利用收入数据中的更多信息, 是对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深化。从实际价值来看,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的背景下, 研究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能够为稳增长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对于解决不平衡的发展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经济增长理论强调, 经济的总产出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总供给 AS 是关于技术 A、劳动投入量 L、资本投入量 K 的函数, 其中技术 A 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研发投入的函数。总需求由消费需求 C、投资需求 I、政府支出 G 组成。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来源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各个方面。只要一个变量有所变动, 经济

增长就会受到影响。同时，收入差距也是一个对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的综合因素，因此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渠道的。由于投入要素即资本 K 和劳动 L，本文简化产出形成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

(一) 劳动和资本要素价格对其投入数量的刺激作用

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用于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另外享受闲暇带来的效用。劳动者在劳动 L 和闲暇 E 之间分配时间。对于个体劳动者而言，当工资上涨时，替代效应使得劳动者增加劳动时间，而收入效应使之减少劳动时间。在人们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的时候，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因此工资的上涨将刺激劳动者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劳动。随着工资的不断上涨，劳动工资达到较高的水平时，替代效应减少到与收入效应相等，此时再提高劳动工资也不能刺激劳动投入的增加，反倒会减少劳动力的投入。总之，在工资水平较低时，工资增长将刺激劳动投入的增加；当工资上升到一定水平时，工资增长将不能再刺激劳动增加。

以 2016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 为例，可以简单验证劳动投入时间与工资的关系。图 2 是周劳动投入时间与月工资对数的散点图。从图 2 中能够直观地观察到，二者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倒 U 型相关关系，即劳动投入时间随着工资的增长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样本观测值为 5 213 个，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0.079。根据本文上述理论分析，在这里简单做了一个回归，结果如下： $workingtime = 13.07lnwage - 0.72lnwage^2 - 4.52$ 。系数都能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基本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劳动投入时间与工资水平呈倒 U 型关系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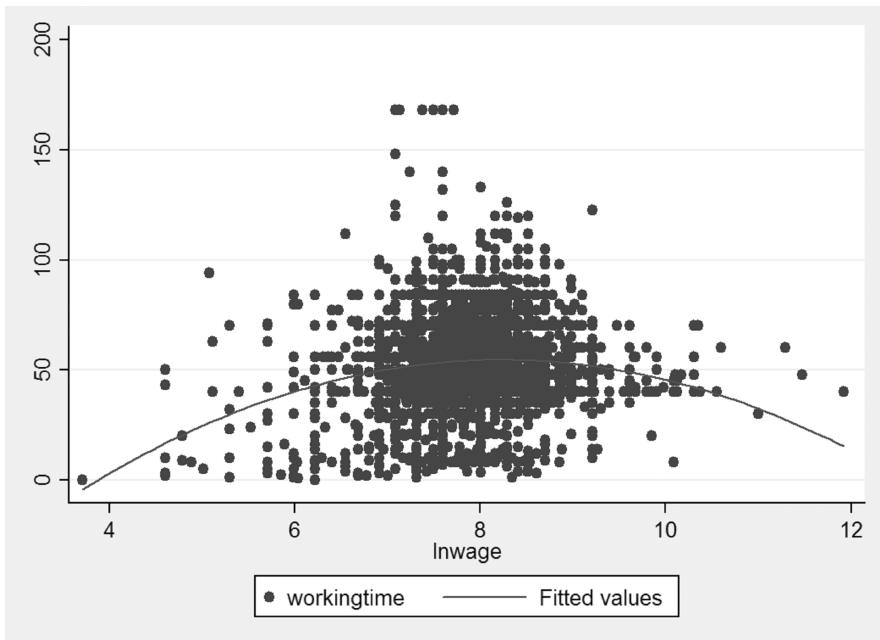


图 2 劳动投入时间与工资对数的散点图

而资本则不一样。对于资本占有者而言,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使得资本占有者在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基本不会再增加其消费。这与现实也是十分接近的,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率相对很低且难以提高。但是资本带来的边际效用与消费有明显的差异。关于资本的边际效用问题,有学者从资本带来的身份地位象征角度论证边际效用不变这一观点;也有学者从资本边际收益大于零的角度来论述。他们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所以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可以保证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趋向于零(Baror, 1990^[22]; Glomm and Ravikumar, 1992^[23]; Joens et al., 1993^[24])。资本的边际收益始终大于零,同时由于资本本身带来的身份地位象征的效用,一些学者认为当资本的边际效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递减之后,其边际效用将保持不变。即使资本的边际效用继续递减,其递减的幅度也将迅速变小,这个递减的速度远远小于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的速度。因此在分析人们将收入在消费和资本积累二者之间进行分配的时候,可以近似认为资本的边际效用不变。

因此资本占有者的收入在消费和投资(储蓄)二者之间的分配规律应该是这样:当消费的边际效用降低到和资本的边际效用一样时,收入的增加只会引致投资增长,而不会再引起消费的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投资收益率或利息率较低,资本占有者也只能继续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因为消费能为他们带来的效用更少。故而资本价格即利息率的变化对于资本投入的刺激作用很小。这一点也被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实际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未能得出确切的结论,而是有正有负,即使有正向影响,其弹性也十分微弱(谭小芬等, 2013)^[25]。

上述分析表明,劳动工资的增长对于劳动要素投入生产的刺激最初是正的,但刺激效果会随着工资的不断上升而逐渐下降并变为负的,而资本价格即利息率的增长对于资本投入生产的刺激基本为零。

(二) 转型国家的现实

转型国家在转型之前,由于体制原因,劳动力供给和需求通过计划的方式进行匹配,工资由国家计划部门决定。此时由于政策上的平均主义,各劳动力之间的异质性即天赋、才能和人力资本投入基本被忽略,他们得到的工资收入相对平均,全社会的劳动收入差距较小。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极低甚至为负,因此私人人力资本投资将持续维持在低水平。而努力工作、增加劳动时长对于劳动者而言同样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会使得闲暇时间被挤占,降低了总体效用。因此劳动者理性的选择不进行或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尽量减少劳动投入量。

当转型发生,引入私有部门并进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时,私有部门将按照市场机制支付工资。对于生产率较高、投入工作时间较长的劳动力,私有部门向其支付较高的工资;对于生产率较低、投入工作时间较短的劳动力,私有部门向其支付相对较低的工资。这时,劳动收入差距开始扩大,私有部门内部出现了劳动收入的差距,私有部门与公有部门也出现了劳动收入的差距。对高生产率的劳动力支付了较

高水平的工资，将激励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从而引致产出增长。同时，在市场机制下生产率越高会使得工资回报越高，这将刺激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带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从刺激劳动投入和刺激人力资本投资两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工资收入不断上升，人们对于闲暇数量的要求也会不断增加，这时工资的上涨将不再能够带来要素投入的增加，反而会使之减少。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也将停滞，这时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但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反倒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总体而言，对于一个转型国家，初期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助于刺激劳动投入数量，也有利于刺激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将引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但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引致劳动投入数量减少和人力资本投资下降，因此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会通过降低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率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转型国家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呈倒 U 型的，初期的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将引致经济增长率提高，在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进一步的差距扩大会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在转型的初期，资本在居民内部的持有是比较平均的。然而经过私有部门的不断发展，资本占有的不平等程度将不断上升。根据前文的分析，资本回报的提升并不能刺激资本投入增加，因此也不会引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当资本占有的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时，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不断上升。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富人的消费率低于穷人的消费率，资本收入差距扩大引致的平均消费率下降，将对经济的总需求方产生负面影响，因而降低总体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资本收入差距扩大也会通过社会稳定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转型国家中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资本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引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本文认为经济增长率与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关系。为了实证检验以上理论假说的正确性，本文设定如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Growth_{it} = \delta_0 + \delta_1 D_i + \delta_2 T + \alpha_1 Gini_cap_{it} + \alpha_2 Gini_wage_{it} + \alpha_3 Gini_wage_{it}^2 + \beta X_{it} + \varepsilon_{it}$$

$$Growth_per_{it} = \delta_0 + \delta_1 D_i + \delta_2 T + \alpha_1 Gini_cap_{it} + \alpha_2 Gini_wage_{it} + \alpha_3 Gini_wage_{it}^2 + \beta X_{it} + \varepsilon_{it}$$

被解释变量有两个： $Growth_{it}$ 代表*i*地区在*t*时期的经济增长率； $Growth_per$ 代表*i*地区在*t*时期的人均 GDP 增长率。主要的解释变量有三个： $Gini_cap_{it}$ 表示*i*地

区在 t 时期的资本收入差距指数； $Gini_wage_{it}$ 表示 i 地区在 t 时期的劳动收入差距指数； $Gini_wage_{it}^2$ 表示劳动收入差距指数的平方项。本文认为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倒 U 型的，因此引入平方项加以验证。 δ_0 、 δ_1 、 δ_2 分别代表截距项、截面固定效应、时期固定效应。 D_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 X_{it}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ε_{it} 表示误差与遗漏项， α_1 、 α_2 、 α_3 、 β 分别代表各自的回归系数。

(二) 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人均 GDP 增长率 ($Growth_per$) 和地区 GDP 增长率 ($Growth$)。

2. 收入差距指数

上述理论分析之中，本文把收入按照来源种类划分为劳动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但是在实际统计中，国家统计局将我国居民的收入来源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本文用于测度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收入差距指数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 也是按照这种划分而来的。显然这种划分并不完全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需要区分的是，每一项收入是由劳动投入得到的回报，还是由资本投入得到的回报。工资性收入显然是劳动性收入的良好代表指标，因此本文使用工资性收入来表征劳动性收入是比较合理的。

而资本性收入相对而言更复杂一些。CFPS 中的财产性收入是由各项租金和出售财产所得组成。这并不适合用作资本性收入的代表值，因为出售财产并不是资本性收入，而是财产形式的变换，更重要的是这种计算方式低估了经营性收入之中的资本收入。对于家庭之间而言，经营工商企业而获得收入的差异是巨大的，而且这一项主要是由于家庭占有资本的差异而形成的。因为如果经营工商企业项目中资本无法为家庭带来收益的话，家庭就会将它们转变为其他财产比如存款以获得利息收入。本文进行了统计，发现 2016 年经营项目总资产在 10 万元以上、5~10 万元、5 万元以下的家庭按股份比例获得的经营性收入平均值分别为 8.9 万元、4.0 万元和 2.5 万元。因此，本文以 10 万元为界，将总资产在 10 万元以上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中扣除平均经营性收入，作为这些高资产家庭的一项资本性收入。本文的资本性收入计算方法为各项出租收入、经营性收入中的资本性收入以及存款利息之和。

本文用基尼系数来代表收入差距的大小。在计算得到各家庭的劳动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之后，利用该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各家庭劳动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微观数据，计算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劳动性收入基尼系数和资本性收入基尼系数。在随后的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替代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

3. 经济增长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国内外大部分研究中选用频率较高、符合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实践的解釋变量引入模型(雷欣等, 2017; 钞小静和沈坤荣, 2014^[26]), 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率及其滞后一期项、国有化率(以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GDP之比表示)、政府消费占GDP之比、平均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劳动者中大专以上学历比例、就业人口数增长率、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基础设施条件(人均公路里程)、城市化率等, 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变量的滞后效应, 本文对多个变量采用了滞后一期的处理。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政府行为以及投资活动有密切关系, 因此固定投资增长率、国有化率、政府消费率都是选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而经济增长与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密切关系, 因此选用了就业人口数增长率和大专以上学历比例等指标。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与外需的密切关系, 同时还选用了外贸依存度指标。另外, 基础设施条件和城市化率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亦纳入本文的模型中。

(三) 数据来源

劳动收入差距、资本收入差距需要利用一个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计算得到。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0年、2011年、2012年、2014年、2016年的数据进行这项工作。CFPS每次调查家庭总数大约在13 000~14 000个之间, 共调查中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家庭数量大概从一百多到一千多个不等。事实上, 许多学者研究省一级地区的收入差距指数也是用这种办法来完成的。如雷欣等(2017)用的CGSS数据库全国的个人样本在11 000左右, 而Marrero和Rodríguez(2013)使用的PSID数据中, 美国各州的样本在50~500之间。本文使用的CFPS数据库有家庭样本13 000~14 000个, 相对比较可观, 具有更高的代表性。

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局网站和年鉴以及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利用2010—2016年期间的CFPS数据, 计算了这5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基尼系数, 按照年份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1)。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见, 我国的劳动收入基尼系数和资本收入基尼系数都比较高, 尤其是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各年的均值基本在0.8以上。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而资本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可以作出一个大胆的推断,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2008年以来总体基尼系数不断下降, 可能主要是来源于劳动收入即工资性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①。

^①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略去了地区性经济增长回归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备索。

表1 各年份劳动收入基尼系数与资本收入基尼系数的描述性统计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Gini_wage_2010</i>	25	0.4739	0.0582	0.4049	0.6882
<i>Gini_wage_2011</i>	25	0.4434	0.0401	0.3711	0.5249
<i>Gini_wage_2012</i>	25	0.4391	0.0356	0.3762	0.5298
<i>Gini_wage_2014</i>	25	0.4162	0.0388	0.3470	0.5084
<i>Gini_wage_2016</i>	25	0.3929	0.0378	0.3244	0.4890
<i>Gini_cap_2010</i>	25	0.8490	0.0707	0.7131	0.9502
<i>Gini_cap_2011</i>	25	0.6409	0.1319	0.4082	0.8900
<i>Gini_cap_2012</i>	25	0.9059	0.0567	0.7724	0.9757
<i>Gini_cap_2014</i>	25	0.8081	0.0515	0.7137	0.9337
<i>Gini_cap_2016</i>	25	0.8330	0.0509	0.7167	0.9221

(二) 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倒U型，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本文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并利用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宏观经济数据如经济增长率和其他控制变量，以及上文利用CFPS测算出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历年的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回归。考虑到投资增长、国有化率、教育程度等因素的滞后效应，本文对使用的控制变量大部分都做了滞后一期的处理。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CFPS问卷调查的时间往往是在当年的7月份，如CFPS2010的调查时间就是2010年7月，而问卷中的问题是近一年内的收入数据。因此，CFPS数据反映的时段其实是2009年7月—2010年7月。而本文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是当年即2010年1月—12月的GDP增长率数据。这样的处理方法使得被解释变量滞后解释变量半年时间，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模型的反向因果问题，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模型(3)是以人均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而模型(4)—模型(6)是以总的地区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其中，模型(3)、模型(6)是将模型(2)、模型(5)中不显著的因素剔除之后的回归结果。

六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中，有四个模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完全符合本文的理论假设即倒U型的影响作用，另外两个模型尽管不够显著，但符号的方向也符合本文的假设。其中，劳动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有三个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一个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劳动收入差距平方项的回归系数有一个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三个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基本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1。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先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上升，而当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继续扩大会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总体而言，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倒U型的。进一步观察可知，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倒U型影响的拐点在劳动收入基尼系数为0.58左右之时，而当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全国劳

动收入的基尼系数并未达到这一数值。有五个回归结果显示，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所有回归系数的符号都是负的，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2。可以判断，资本收入差距的确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表 2 经济增长回归基准模型

解释变量	人均 GDP 增长率 (<i>Growth_per</i>)			地区 GDP 增长率 (<i>Growth</i>)		
	(1)	(2)	(3)	(4)	(5)	(6)
<i>Gini_cap</i>	-2.576 (1.878)	-3.379** (1.440)	-3.504** (1.410)	-3.693* (1.934)	-3.97*** (1.478)	-4.25*** (1.438)
<i>Gini_wage</i>	144.126*** (39.181)	65.120** (26.820)	67.980*** (26.324)	122.8*** (39.909)	40.389 (27.523)	40.816 (26.822)
<i>Gini_wage</i> ²	-127.016*** (42.023)	-58.552** (28.449)	-62.587** (28.083)	-105.05** (42.813)	-31.978 (29.193)	-30.866 (28.545)
<i>invest_grate</i>		10.798*** (1.835)	10.894*** (1.768)		11.2*** (1.884)	10.9*** (1.803)
<i>invest_grate_1</i>		6.793*** (1.862)	6.496*** (1.853)		7.783*** (1.913)	7.853*** (1.880)
<i>soeratio_1</i>		1.936 (1.320)			3.253** (1.384)	2.969** (1.370)
<i>gratio_1</i>		-19.546** (8.295)	-13.906** (6.978)		-14.493* (8.677)	-12.627* (7.564)
<i>eduyear_1</i>		-1.875*** (0.569)	-1.864*** (0.496)		-1.086* (0.593)	-0.497** (0.242)
<i>uni_ratio_1</i>		0.162** (0.068)	0.126** (0.062)		0.016 (0.070)	
<i>laborrate_1</i>		-3.449 (6.476)			-3.768 (6.641)	
<i>traded_1</i>		-0.215 (1.134)			0.952 (1.181)	
<i>infrast_1</i>		0.202 (0.325)			-0.023 (0.342)	
<i>urbanrate_1</i>		-2.831 (5.096)			3.689 (5.314)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i>Constant</i>	-26.522*** (9.259)	10.761 (7.850)	9.770 (7.476)	-19.694** (9.424)	7.290 (8.108)	3.869 (6.770)
观测值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下表同。

资本收入差距对人均 GDP 增长率和地区 GDP 增长率二者的影响基本一致，都显著为负，但劳动收入差距对于人均 GDP 的解释力要优于对地区 GDP 增长率的解释力，这说明劳动收入差距对于地区人均产出的影响更大，对于地区经济规模的影响更小。可能的解释是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在初期提高了个人投入的劳动时间和人力资本投资，因而使得人均 GDP 增长加快。另一种可能是人们更偏好于居住在收入差距略小一些的地区，因此搬离差距较大的地区。

其他控制变量中,投资增长率及其滞后项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同时高等教育率对经济增长是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人力资本的增加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而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购买比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国有化率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三) 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以上分析表明,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在劳动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的时候,差距的扩大可以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应着对劳动要素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劳动投入增加和人力资本提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当劳动收入差距达到较高程度的时候,随着劳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就成了阻碍作用,这也符合前文的理论分析。

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设也是一致的。本文认为原因如下:第一,资本收入差距对于刺激资本形成的作用是比较小的,许多实证研究也发现利率对于存款的影响为正,但弹性很小;第二,资本收入差距与劳动收入差距一样,作为上一期经济运行的结果,自动成为了下一期经济运行的条件,而收入差距过大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负面的条件,这就会对下一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资本收入差距越大,经济增长率越低。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是收入差距衡量的稳健性检验。本文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但有一些学者指出,基尼系数对富人的观察值比较敏感(万广华,2008)^[27],微观经济调查又往往被富人拒答,因此本文改变了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用泰尔指数来代替基尼系数做稳健性检验。二是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本文采取混合回归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考虑到省份的个体性差异,通过虚拟变量控制住省份的个体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避免模型的互为因果内生性,本文以滞后一期的人均GDP增长率或滞后一期的地区GDP增长率为工具变量,采用面板GMM估计。三是考虑到异方差问题的可能性,本文采用了稳健标准误的估计。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和模型(3)是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模型(4)是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来看,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是比较稳健可靠的。所有资本收入差距的模型回归系数方向与基准模型都一致,其中65%的模型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对于劳动收入差距及其平方项来说,所有模型回归系数的正负方向也与基准模型一致,85%的模型回归系数是显著的,由此可知,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类型	自变量	人均 GDP 增长率 (<i>Growth_per</i>)		地区 GDP 增长率 (<i>Growth</i>)	
		(1)	(2)	(3)	(4)
泰尔 T 指数	<i>Ge_cap</i>	-0.043 (0.287)	-0.274 (0.206)	-0.068 (0.294)	-0.254 (0.211)
	<i>Ge_wage</i>	19.832*** (3.764)	7.826*** (2.717)	17.907*** (3.826)	5.551** (2.783)
	<i>Ge_wage</i> ²	-8.270*** (1.856)	-3.222** (1.292)	-7.149*** (1.882)	-1.823 (1.325)
混合回归	<i>Ge_cap</i>	-2.027 (1.595)	-4.192*** (2.218)	-3.572* (1.556)	-5.040*** (2.099)
	<i>Ge_wage</i>	123.893*** (29.391)	78.019*** (44.234)	107.652** (28.687)	51.120* (41.858)
	<i>Ge_wage</i> ²	-106.949** (31.189)	-72.758** (47.484)	-90.624** (30.442)	-43.352 (44.934)
省份固定效应	<i>Ge_cap</i>	-2.783 (1.985)	-2.259* (1.915)	-2.665* (1.224)	-3.752* (1.448)
	<i>Ge_wage</i>	153.747*** (42.229)	17.811 (40.735)	64.657** (22.463)	137.712*** (27.619)
	<i>Ge_wage</i> ²	-136.627*** (45.273)	-18.552 (43.671)	-58.807** (23.479)	-119.420*** (29.221)
GMM	<i>Ge_cap</i>	-3.238** (1.470)	-3.238** (1.407)	-4.241*** (1.407)	-4.241*** (1.470)
	<i>Ge_wage</i>	71.803*** (26.735)	71.803*** (25.589)	45.911* (25.589)	45.911* (26.735)
	<i>Ge_wage</i> ²	-67.472** (28.351)	-67.472** (27.136)	-38.922 (27.136)	-38.922 (28.351)
稳健标准误	<i>Ge_cap</i>	-2.576 (1.377)	-3.379** (1.573)	-3.504** (1.451)	-3.693*** (1.520)
	<i>Ge_wage</i>	144.126*** (22.942)	65.120*** (23.292)	67.980*** (15.745)	122.772*** (15.172)
	<i>Ge_wage</i> ²	-127.016*** (21.525)	-58.552*** (16.255)	-62.587*** (15.652)	-105.051*** (22.149)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讨论了转型国家中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差距在转型国家的形成和扩大，以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几个途径：刺激劳动投入途径、刺激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和抑制消费途径；分析了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据此提出假设，劳动收入差距在转型国家的扩大会引致经济增长先上升后下降，呈倒 U 型；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将产生负面的影响。通过采取 CFPS 数据和省际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了省际面板模型对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研究结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一，本文的研究是近年来将收入分配差距结构化思想的延续，但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分析了被西方学者回避或忽略的资本占有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丰富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构化理论；第二，在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上，本文使用的结构化收入数据无需主观设定，相较于当前对收入不平等的分解无论是非参法还是参数法都需要建立在主观的环境和努力变量设定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更加客观，数据中包含的信息也更为丰富，避免了

当前结构化研究的主观性，结论更为真实可靠；第三，在研究结论上，本文发现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从现代经济学的实证角度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另外，本文还发现即使是相对于资本收入差距而言更为公正合理的劳动收入差距，类似于西方学者强调的努力不平等下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并不总是正向的，而是倒U型的。当劳动收入差距较大时，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两点结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还具有明确的政策涵义。

第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根据本文的统计分析，总体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主要源自于劳动收入差距的缩小，而资本收入差距并未呈现缩小的趋势。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资本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确定为负的。而过去几年中国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从现实也可以看到，尽管2010年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同时经济增长率也在不断下行，因此，若希望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来促进经济增长，则应该着眼于缩小资本性收入的差距。

第二，关于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认为要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来全面认识。一方面，由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劳动收入差距扩大，能够刺激劳动力要素投入生产的数量以及质量，最终将提升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同时差距的扩大也会通过消费渠道、社会秩序渠道等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收入差距较大时，就要更加注重公平问题。我国分配制度的指导思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被修改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到十九大报告里明确提出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凸显出党和政府对公平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因此，本文认为，在劳动收入差距问题的政策取向上，既不能走过去的老路，再回到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也不能走西方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放任市场，使得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应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道路，既要以工资水平差异来提升劳动力的积极性、促进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也要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对由于市场不完备引致的不合理的劳动收入差距予以消除，对过大的劳动收入差距予以调节，以财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保证劳动收入差距维持在一个既能够被普遍接受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区间，这样才能保障无论是高技能劳动者还是中低技能劳动者都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三，即便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劳动收入差距也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在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有效分配制度之上。政策制定者不能因为劳动收入差距正向影响经济增长就盲目放任差距扩大，而应该寻求对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使工资价格能更好地反映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最大程度地刺激劳动参与和人力资本投资，释放劳动力的活力和创造力。

第四，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资本收入差距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

相比于5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劳动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33, 资本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已达到惊人的0.807。而且相对而言, 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因此, 如果能够有效地缩小资本收入差距, 那么既能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的资本收入差距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 政府亟需出台一系列政策缩小资本性收入差距。而资本性收入差距最大的来源就是非农经营性收入中的资本收入差距, 剔除各年非农经营的资本性收入之后, 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立刻从平均0.845下降到0.598。因此本文认为, 对于资本收入差距, 主要应该缩小的是由于生产资料占有差异而引致的资本收入差距。这就要求对股息红利适用个人所得税率进行税制改革。

[参考文献]

- [1]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 (2): 139-191.
- [2] PASINETTI L. Rate of Profi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 (4): 267-279.
- [3] CHIU W H. Income Inequality,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8, 108 (446): 44-59.
- [4] LI H, ZOU H F. 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0, 2 (3): 318-334.
- [5] BENABOU R. Inequality and Growth [J].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6 (11): 11-74.
- [6] GALOR O, TSIDDON 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The Kuznets Hypothesis Revisited [J]. Economica, 1996 (63): S103-S117.
- [7] SAINT-PAUL G, VERDIER T. Education, Democracy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42 (2): 399-407.
- [8] ALESINA A, RODRIK D.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 (2): 465-490.
- [9] GALOR O, ZEIRA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 60 (1): 35-52.
- [10] MURPHY K M, SCHLEIFER A, VISHNY R W.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 (5): 1003-1026.
- [11] GALOR O, MOAV O. Ability-biased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 Wag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 (2): 469-497.
- [12] 尹恒, 龚六堂, 邹恒甫.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回到库兹涅茨假说 [J]. 经济研究, 2005 (4): 17-22.
- [13] 靳涛, 邵红伟. 最优收入分配制度探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倒“U”形影响的启示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33 (5): 44-64.
- [14] FERREIRA F H, GIGNOUS J. The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Latin America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1, 57 (4): 622-657.
- [15] ROEMER J 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6] 江求川, 任洁, 张克中. 中国城市居民机会不平等研究 [J]. 世界经济, 2014, 37 (4): 111-138.
- [17] 龚锋, 李智, 雷欣. 努力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 测度与比较 [J]. 经济研究, 2017, 52 (3): 76-90.
- [18] BOURGUIGNON F, FERREIRA F H, MENENDEZ M.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Brazil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7, 53 (4): 585-618.
- [19] 邵红伟, 靳涛. 收入分配差距根源研究——基于三步法收入分配分析框架 [J]. 社会科学, 2016 (11): 44-51.

- [20] MARRERO G A, RODRIGUEZ J G.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4): 107-122.
- [21] 雷欣, 程可, 陈继勇.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J]. *世界经济*, 2017, 40 (3): 26-51.
- [22] 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 S103-S125.
- [23] GLOMM G, RAVIKUMAR B. Public Versus Privat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Endogenous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 (4): 818-834.
- [24] JONES L E, MANUELLI R E, ROSSI P E. Optimal Taxation in Models of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 (3): 485-517.
- [25] 谭小芬, 张明, 孙晶晶. 中国实际利率对家庭储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3, 35 (3): 11-22+124.
- [26] 钞小静, 沈坤荣.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 2014, 49 (6): 30-43.
- [27] 万广华. 不平等的度量与分解 [J]. *经济学 (季刊)*, 2009, 8 (1): 347-368.

(责任编辑 王 瀛)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Labor Income Gaps and Capital Income Gaps on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XIAO Wei

Abstract: For the past four decades, China has achiev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However, the income gap has also been expanding.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labor income gap and the capital income gap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a transitional economy, and constructed a panel data model analysis by using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and inter-provincial macroeconomic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labor income gap on economic growth can be summarized as inverted U-shape in the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hat is, the expansion of labor income gap will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ile when the income gap is too large,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labor income gap will hinder economic growth. The impact of the capital income gap on economic growth is negative.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explains the fact that Chinese economy has been rapidly growing while the income gap has been expand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downtur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eady growth and social justic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labor marke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reforming the tax policies of capital income.

Key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Labor Income Gap; Capital Income Gap; Economic Growth